

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中的平民治家智慧

□ 蒙 曼

朱柏庐（1627—1698年），本名用纯，字致一，明末清初苏州昆山人。其父朱集璜为明末抗清义士，1645年殉国于昆山保卫战。朱柏庐深受儒家忠孝思想影响，效法西晋王袁“攀柏庐墓”之举，终身不住清廷。这种特殊经历使其家训既蕴含爱国气节，又具备强烈的平民关怀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记载，其《治家格言》本名《朱子家训》，因与朱熹同名著作相区别，后世多称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。全文以日常训诫为线索，将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的道理融入柴米油盐的琐碎中。没有高谈阔论，只讲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”的朴素认知；不谈玄奥哲理，只说“与肩挑贸易，毋占便宜”的处世准则。正是这种扎根生活的智慧，让平民百姓在耳濡目染中读懂治国治家修身要义，成为跨越数百年的生活指南，尽显明清家训中平民治家智慧。

家训的平民化

家训核心的平民化转变。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与传统家训如朱熹家训的根本差异，在于其将儒家伦理从抽象的纲常名教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。其以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”开篇，将道德教化融入晨起劳作这一最基础的日常生活场景，用“内外整洁”的务实要求替代了空洞的道德说教。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。明清之际，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壮大，家训的受众不再局限于士族精英，而是扩展至商人、手工业者等普通百姓。朱氏家训标志着中国家训从“士族规范”向“平民指南”的转型。这一转型的核心价值，在于它打破了儒家伦理与平民生活的隔阂，将“忠孝节义”等抽象概念转化为“洒扫应对”的具体行为准则，使道德教化真正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

家训语言的平民化革新。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在语言风格上展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。全文虽仅516字，却完全摒弃了传统家训引经据典的写作方式，转而采用“宜未雨而绸缪，毋临渴而掘井”这样通俗易懂的格言体表达。这种白话书写既贴近市井百姓的日常用语，又通过“器具质而洁，瓦缶胜金玉”等生活化比喻，将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指南。这种语言革新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它打破了传统家训的学术壁垒，使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也能轻松理解和接受。同时，这种通俗化

的表达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道德话语体系，让儒家伦理从书院讲堂真正走进了市井街巷。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变，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平民化进程，使其从士大夫的专属读物转变为普通家庭的生活指南，更为后世《弟子规》等蒙学教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。

家训内容的平民化适配。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在内容选择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，将关注点从士大夫的治国理想转向平民的日常生活。其训诫内容高度聚焦于普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。在持家方面，强调“饮食约而精，园蔬愈珍馐”的实用节俭观；在邻里关系上，主张“见贫苦亲邻，须加温恤”的互助精神；在婚嫁观念中，提出“嫁女择佳婿，毋索重聘”的务实态度。这些内容完全围绕平民家庭的生存需求展开，与朱熹等士大夫家训关注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内容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。清初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壮大，普通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科举入仕，而是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市井社会中维持家业、处理人际关系。据记载，当时苏州普通市民家庭年收入约30两白银，维持体面生活需要精打细算。朱柏庐的家训正是针对这一现实需求，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活方案。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家训文化的重大转型。它将道德教化从抽象的伦理说教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导，使儒家思想真正融入平民的日常生活。这种“市民实用手册”式的家训，不仅满足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，更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平民化进程。

核心治家理念

勤勉持家的实践哲学。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中勤勉持家的核心观念，具体体现在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必亲自检点”这句训诫里。它不只是对作息时间的简单规定，更承载着对家庭秩序和个人品德的深层要求。这一观念源自农耕文明的时间伦理，将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。其智慧的应用与明清平民的生活紧密相连，清代农书《补农书》记载，江南农户每日劳作长达14小时，“黎明即起”成为他们安排农耕生产、料理家庭事务的行动指南。晨起洒扫不仅是清洁环境的实际操作，更是家庭成员协作分工的开端，体现了对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。

端，在共同打理家事的过程中，责任意识悄然养成，让平凡的日子井井有条，让平民在日常劳作中实现修身。

俭以养德的辩证智慧。此核心观念围绕节俭与适度消费展开，“瓦缶胜金玉”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等，倡导着朴素务实的生活态度与合理消费的平衡之道。这些话语并非主张极端节俭，而是强调对物力的珍惜与消费的理性。其智慧的应用在明清江南市民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平民们践行着朱柏庐“勤以开源，俭以节流”的辩证观，既不做守着财富却苦了生活的“守财奴”，也坚决抵制“暴殄天物”的奢靡之风，将节俭自然融入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。它让平民在物质生活中保持清醒理性，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，又培养了节制与自律的品性，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协调发展。

伦理教化的实践路径。这部分包含祭祀与教育两方面的重要观念，祭祀观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”，强调对祖先的虔诚缅怀；教育观则体现在“教子要有义方”等表述中，注重通过日常引导实现品德培养。两者共同构成了伦理教化的实践路径，着眼于家族价值观的传承与后代的品德塑造，其智慧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。在平民家庭中，祭祀不仅是仪式，更是凝聚人心、传承家族价值观的纽带，为平民教育后代提供了可效仿的模式。这种智慧的价值在于构建了稳固的家庭伦理共同体，祭祀借助祖先崇拜增强家庭凝聚力，为平民家庭培养品德端正的后代、维系家族延续提供了有效方法，也对社会整体的伦理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。

历久弥新的治家智慧

以节俭伦理守护生活本真。“思来处不易”的追问，将日常消费与他人劳动紧密相连。一碗米饭背后是农夫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耕耘，一寸布料凝结着织女“纤纤擢素手”的辛劳。这种认知会自然生出对资源的珍惜，不是被迫节俭衣缩食，而是主动拒绝浪费。饭食吃净、衣物穿旧，在物尽其用中体会来之不易的厚重。“瓦缶胜金玉”的辩证思维更打破了对物质的盲目崇拜；粗瓷碗盏若洁净实用，远胜金玉器皿的浮华；园中小菜若烹饪精心，更比山珍海味动人。这背后是对“需求”与“欲望”的清醒划分。器物核心价值是“用”而非“炫”，饮食的本质是“养”而非“奢”。

“奢”。它提醒家庭拒绝“为消费而消费”的陷阱，即不必追求名牌服饰，整洁得体便是体面；无需攀比山珍海味，家常便饭自有温情。这种节俭的生活态度，让人们明白真正的富足从不取决于财富多寡，而在于对生活本真的敬畏与珍惜。

以未雨绸缪保障家庭稳定。“未雨绸缪”的实践远比字面含义更丰富。在物质层面，它是粮仓里的储备粮、箱底的应急钱，是“天晴修屋顶”的务实；在能力层面，它是家长掌握的谋生技艺、家庭维系的邻里情谊，是多一手准备的远见。这种智慧拒绝侥幸心理，明白人生总有意外，丰年时不挥霍，才能在歉年有依靠；顺遂时多积累，才能在困境中有退路。“自奉必须俭约”与“宴客切勿流连”是“俭约”，不是吝啬，“不流连”不是失礼，是拒绝因虚荣透支未来。宴席上的攀比、应酬中的铺张，看似是体面，实则是挖家庭根基的隐患。这些“绸缪”之举或许不够“潇洒”，却能让家庭在失业、疾病等风浪来临时，有底气说“不怕”。

以关系准则凝聚家庭共识。家庭关系核心是“以义为利”，用情义维系的纽带，远比金钱更坚韧。对内而言，“分多润寡”打破了“各顾各”的利益壁垒。这种“让利”不是吃亏，而是用包容化解纷争，让亲情在扶持中更深厚。“法肃辞严”并非僵化的等级压迫，而是明确长幼边界的温情智慧。晚辈对长辈的尊重，是传承“孝”的底色；长辈对晚辈的宽厚，是传递“慈”的温度，这种“有规矩的爱”让家庭既有秩序又不失温暖。对外而言，“择婿重贤、娶媳重淑”撕开了婚姻的物质面纱，彩礼再多，不如人品端正；嫁妆再厚，不及勤俭持家。“施惠勿念、受恩莫忘”将人际交往升华为情义积累。帮人不求回报，是内心的豁达；受人恩惠记终身，是处世的厚道，这种轻功利、重情义的态度，让家庭在社会关系中始终保有温度。最终，这些智慧启示现今，家庭的力量从不源于财富堆砌，而在于成员能否以伦理为尺，在利益前让一步，在纷争中忍一分，在相处中多一分真心，如此才能让家成为抵御世事风雨的“避风港”。

（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


《吕氏春秋·贵直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：春秋末年，晋国大臣赵简子率兵攻打卫国，两军开战之际，赵简子远远地躲在盾牌后面擂鼓指挥攻击，结果士卒踌躇不前。赵简子气愤而感慨地说：没想到战斗力拉到这个地步！烛过听闻此言，径直对赵简子说：“亦有君不能耳，士何弊之有？”意思是说，是你作为主帅做不到，士卒哪里有不对？主帅若不能奋不顾身，身先士卒，凭什么责备将士呢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赵简子遂弃盾而立于箭雨中奋力击鼓，将士见状士气高涨，奋勇争先，结果只击鼓一次，晋军就登上了卫国城墙，大获全胜。这则故事生动说明，表态不如表率，领导者身先士卒就是最好的动员令。

“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”表率从不在漂亮话里，不在门面功夫上，而在躬身示范、挺身为旗的一举一动中。汉代“飞将军”李广作战勇敢，武艺超群，“得赏赐辄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共之”，所以他的士卒都甘愿生死相随，令匈奴闻名胆寒。司马迁对李广的第一印象是“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”。虽然不善言辞，但李广的“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”，天下皆闻。身教胜于言教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表率，首在从我做起。《宋史·宋祁传》说：“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”意思是，如果自身不能作出表率，就无法让别人听从；如果不能以身作则，就不会使别人信服。东汉羊续到南阳任太守时，当地奢靡之风盛行。羊续虽然对此非常反感，但并没有简单下达禁令，而是以身作则，用表率行动实现移风易俗。在生活上，羊续“常敝衣薄食，车马赢败”，给人以强烈的“视觉冲击”。南阳的官员见太守尚且如此，也纷纷收敛，不敢大肆浪费，南阳的风气很快就好了起来。在廉政上，面对属下进献的鲜鱼，羊续收下后悬挂于中庭，当属下再献时，他手指枯鱼，正色相示。羊续“悬鱼拒贿”的故事流传开来后，也再无人敢给他送礼了。

表率，难在始终如一。正所谓人前表率易，人后表率难；一时一事表率易，一生一世表率难。纵观历史长河，有人在大庭广众时正气凛然，却在独处暗室时放纵私欲；有人在众目所睹下整躬率物，却在无人监督时恣意妄为。东汉杨震一生刚正不阿，勤勉清廉。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，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杨震知遇推荐之恩，特在夜深人静时送来丰厚黄金。杨震虽不接受，反而严厉斥责了王密。王密辩解道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杨震正言厉色道：“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你知。何谓无知！”清代官员叶存仁为官多年，毫不苟取。一次离任时，下属特地在夜里送来礼品，以避人耳目。叶存仁赋诗一首，赠礼而去：“月白风清夜半时，扁舟相送故迟迟。感君情重还君赠，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不论是杨震的“四知拒金”，还是叶存仁的“畏己知”，都启示我们：真正的表率从不是刻意为之的表演，只有将习惯成自然的高度自觉内化为“心之主”，外化为“行之常”，方能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“不改其心、不移其志、不毁其节”。

表率之力胜于言传

□ 陈培浩

表率，重在从严治吏。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十分注重严吏养民、治官以德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桓公曾接受宋国卿大夫华父督的贿赂，并将所获大鼎置于太庙，这在当时是有违礼制的。鲁国大夫臧哀伯谏言劝诫道：君主当为百官表率，需“昭德塞违”，彰显美德而杜绝邪恶。今反将贿器示于太庙，实乃“昭违塞德”，若百官效法则国将危矣。由此，臧哀伯得出了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”的千古警句。从孔子主张的先“修己以敬”，而后才可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到《韩非子》中“故吏者，民之本纲者也，故圣人治吏不治民”，再到《群书治要》中“为政者，莫善于清其吏也”，历史镜鉴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官吏能否在奉公守法、清正廉明上作出表率，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、社会稳定。

“风行于上，俗化于下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，自上而下，一级带一级，一级做给一级看，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。说一千道一万，都不如做出样子给人看。这些生动的历史故事启示我们，改革发展需要示范引领，改进作风更需标杆带动。抓住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，坚持标准更高一层、要求更严一分，做到令行禁止、以身作则，就能形成“头雁效应”，激发“群雁齐飞”，就能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，无惧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。



（上接1版）

切实强化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原理研究。人工智能不能仅局限于大模型技术发展，还亟待探索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、方法、技术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上，坚持推理、决策并重，加强专用人工智能、决策式人工智能发展。在计算机图像识别、语音识别技术基础上，继续加强智能视觉感知、机器学习、深度学习研究。智能视觉感知技术从2D（二维）空间智能向3D（三维）迈进。积极研究物理仿真技术，推进从大语言模型向构建大型世界模型转变。加快具身智能、群体智能、类脑智能等前沿理论和底层技术研究。

进一步加强AI大模型技术研发创新。围绕高级推理能力、可靠工具调用、深度多模态交互、自主学习决策等新方向，探索新型模型架构和训练方法；加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大模型测试平台和体系，持续推动高质量、大规模、多类型中文数据集建设和开放共享；力争在大模型机理、多模态大模型、高质量数据集等领域实现创新性突破。打造多源多模态国家级数据资源汇聚平台，汇聚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。开展大模型迁移调优、异构混训、算力调度等关键技术的试验验证，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解决方案。

加快国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。AI芯片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，聚焦GPU芯片，大力强化产业上下游自主创新，推进人工智能软硬件适配，打造协同生态。积极推动国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先支持基于国产AI芯

片的智算中心。打造云边端一体化协同架构，前瞻布局时空智能等创新性基础设施，努力建成广覆盖、高效率、安全稳定运行的智能基础设施。聚焦算力发展需求，推动底层硬件、基础软件、应用软件等适配协同。建立多部门、多行业交叉合作机制，培育各应用领域算力龙头企业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，构建完善的算力生态链。

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前沿技术。加强类脑芯片、光计算芯片、量子计算芯片等领域与人工智能关键研究协同攻关，支持交叉学科领域核心技术研究，在战略性、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实现突破。加快智能体关键核心技术战略布局，加大力度布局智能体产品与开发平台。推动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生态建设，重点突破环境感知、自主决策、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，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建设国家级具身智能创新平台，加速技术成果转化。

深入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，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

人工智能的浪潮已至，未来已来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，其对社会就业结构、生产方式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远超预期。持续深入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深耕应用场景，赋能千行百业，驱动经济社会智能蝶变，是时代赋予

我们的重大机遇，也是加快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。

AI引擎助推新型工业化。制造业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核心领域，人工智能助力推动制造业从单点应用向全流程、全产业链的智能升级转变，正成为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驱动力。赋能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。在研发设计阶段，应用智能原型设计和智能工艺设计等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并提升设计效率。在中试验证阶段，推进智能虚拟中试、智能仿真、新工艺智能验证，提升试验过程效率和智能化水平。在生产制造阶段，加强智能生产调度、质量控制、预测性维护、智能安全监控等技术应用，提升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水平。在营销服务阶段，推广智能客服、商品三维模型等，提高售后服务，改善用户体验。在运营管理阶段，利用智能化供应链管理、智能运营数据洞察和知识管理，降低运营成本，强化智能决策。赋能重点行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，通过持续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“深度行”等活动，聚焦重点行业，打造行业专用大模型并推动落地，借助人工智能实现企业对原材料采购、生产加工到产品配送的智能精准调控，实现生产流程优化，显著提升产能，降低人力成本与能源消耗，助力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；打造一批智能化示范工厂和智慧绿色供应链，遴选发布“人工智能+绿色转型”优秀案例，推广应用示范、案例，加速行业绿色智能化转型升级。

AI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创新。围绕智能网联汽车、人形机器人、人工智能手机、人工智能电脑、AR/VR（增强现实/虚拟现实）设备等智能硬件领域加大布局力度，加速产品智能化迭代升级。加快发展智能消费终端。国内厂商已成功研发超百款人工智能手机、人工智能电脑、智能眼镜等各类集成人工智能能力的智能终端，实现从传统硬件到智能助手的“智变”升级。推动超级智能终端发展。加快推动具备更强智能和更广泛连接能力的超级智能终端发展，加快产业化进程和商业化应用，使其成为承载各类AI应用的新入口和新平台。加快赋能智能装备。推动大模型与智能装备深度融合，促进智能装备从全面感知向智能决策跃升，提升高端装备决策控制、自主学习和深度交互等智能化能力。

AI助推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。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汽车、人形机器人、无人机等加速融合，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。积极部署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，有序推进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和实际道路通行试点，加快试点部署Robotaxi（自动驾驶出租车）、乘用车自动驾驶、无人货运等。瞄准具身智能尤其是人形机器人，以应用牵引技术创新突破，不断提升智能机器人技术水平。发挥人工智能对智能体、脑机接口、生物制造、量子科技等领域的“助推器”“催化剂”作用，推动未来产业孵化加速。加快软件应用智能化升级，探索基于大模型技术的工业软件创新和重构。

AI助力提升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

智慧化。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，同样展现出巨大潜力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，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交通管理、环境监测、公共安全等领域，有效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。在医疗健康领域，基于人工智能的辅助诊断系统能够帮助医生提高诊断准确率和效率，特别是在早期癌症筛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在教育领域，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学习系统能够提供定制化的教学资源，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。通过持续开展供需对接等活动，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广泛社会应用场景的落地生根，确保科技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。

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,构建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制度机制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，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，坚持自立自强，突出应用导向，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、安全、公平方向健康发展”。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、市场和产业体系优势，加快构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制度机制。

强化顶层战略规划设计。当前正是“十五五”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，必须把人工智能发展提升至战略层面系统谋划，进一步强化顶层战略

框架设计和统筹协调。特别是要对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，明确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主体间的界限和协同配合，集中力量攻关突破，避免出现“千模大战”“百企争先”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局面。

加快构建创新体系。从国家层面部署加强人工智能基础原理、AI芯片、模型技术、机器学习原理等底层技术攻关，补上短板。坚持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设计实施“揭榜挂帅”等新型攻关机制，重点支持AI芯片关键技术路线和关键核心企业发展，大力培育龙头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发展。切实加强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及创投生态建设，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政策体系，共同营造鼓励创新良好氛围，激发全社会参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热情。

健全支撑服务体系。加强政策支持，综合运用知识产权、财政税收、政府采购、设施开放、教育人才等政策，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创新，加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保障力度，特别是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引领撬动作用，发展耐心资本，引导地方、社会资本投向关键核心技术。强化标准引领，推动急需的国家、行业关键标准研制，牵引技术迭代升级。完善开源生态，加快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，汇聚国内外企业、科研院所、个人开发者力量，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放生态。

（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）